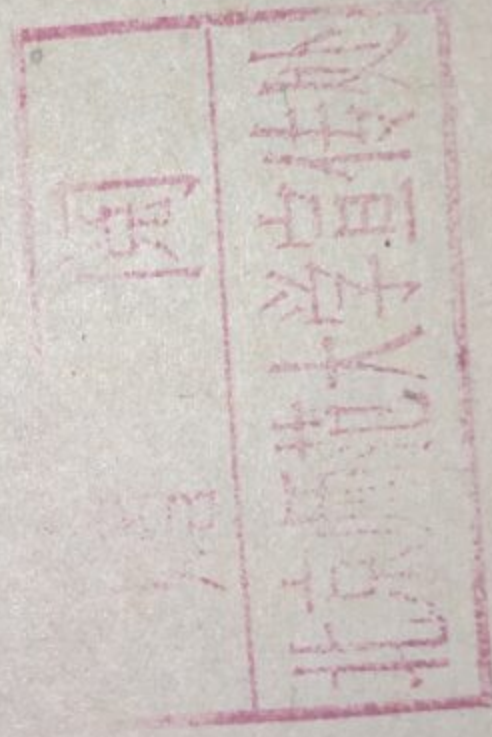


#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 破坏教育革命纪事

(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大批判组

一九七七年四月

## 前 言

长期以来，“四人帮”把教育战线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重要阵地。他们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肆意歪曲、篡改毛主席对教育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称王称霸，为所欲为，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为了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种种罪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肃清他们的流毒。现在把我们见到的一些材料按时间顺序编排起来，大体可以看出“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过程。材料不完全，有的不一定十分准确，仅供参考。

## 一九六六年

七月二十七日 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窜到北京师大。江青在全校大会上支持一派，反对一派，提出“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开”，蓄意挑动群众斗群众，并肆意辱骂广大党、团员是什么“特务”搞“盯梢”，是“革命的绊脚石”，制造思想混乱，从一开始就妄图把文化大革命引向歧途。

十一月八日至十二月六日 “四人帮”黑爪牙谭厚兰秉承其黑主子的旨意，以“师大井冈山”名义去山东曲阜讨孔”。谭厚兰讲：“我们这次去讨孔，陈伯达是支持的”，“过去国务院一小撮走资派也以保护历史文物之名，保护孔家店”。“我们这次去造反，不是单纯去搞死人，而是要把搞死人和搞活人结合起来”。“我们这次去造反，就是要彻底打倒孔家店，肯定会遇到阻力，总理会不会出来干预”？他们在曲阜开大会，砸牌坊，刨古坟，烧神象，砸了国务院立的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写了《给国务院的一封抗议信》狂叫什么：“任何人，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我们就要跟他进行坚决的斗争，直到罢他的官，夺他的权，撤他的职！”把罪恶的矛头直指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十一月，谭厚兰在北京师大全校大会上肆意歪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别有用心地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还胡说：“造反派有事都是往

《红旗》跑，保守派有事都往国务院跑。”再一次把罪恶矛头指向周总理。

## 一九六七年

四月十二日 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什么“我还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还不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叫嚷：“这十七年来，……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肆意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并疯狂叫嚣：“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妄图把教育阵地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

在这次会上她还说什么：“《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的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妄图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

七月二十三日 江青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代表时，对抗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指示，公然煽动武斗，说：“‘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他们拿起武器打你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己的武器不能放下。”

九月二十日 张春桥在上海高校教育革命组负责人座谈会上说：“教育革命最吃力，象工厂、机关也很困难，但总有个先例吧。……问题最难是教育革命，虽然过去有个抗大，现在还不能全部照搬，那毕竟是军事院校。办成现在的抗大式学校又怎么办？没有先例。……”公然否定老解放区的革命教育传统。

九月二十九日 在与上海高校负责同志座谈时，张春桥说：“中央希望大、中、小学上海提供经验。这次临走时，江青说：‘上海在教育改革上要提供经验。’”

十月二十六日 三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发表“复课闹革命”的重要指示；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十月二十六日，徐景贤在上海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别有用心地歪曲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说什么：“复课闹革命，重点不在‘复课’，而在‘革命’”。

## 一九六八年

八月二十二日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第五十九次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派工宣队一事时说：“老大难头一位的就是大学，……因为这些地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而且知识分子是顽固的，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如师范学院你们本事很大，现在我们再加一份力量，看看你们资产阶级有多大本领。”

八月 七月二十七日毛主席亲自委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北大。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开了崭新局面。张春桥对上海市高校迟迟不派工宣队，八月底在上海市工宣队的一次大会上，张春桥不打自招地说：“上海形势比北京好，当初我不想派工宣队进驻学校，后来在毛主席的催促下，才比较匆忙地组织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八月二十六日进驻上海各个高校。”

张春桥同“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的一次谈话中疯狂叫嚣：“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有些人问题不大，工作也作不好，也不好处理，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人搞下去，是个机会。”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妄想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 一九六九年

六月 张春桥讲：“四大（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不光是学生贴先生，教员也可以贴教员”，竭力挑动群众斗群众。

六月六日 张春桥在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编写人员座谈会上说：“孩子不犯错误不可能，他这个时候正是犯错误的时候，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就不要关，要使他们生动活泼，他以后可以改嘛！”

七月二十七日 张春桥在上海市庆祝“七·二七”一周年的大会上讲话，肆意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说什么：“我们

搞教育革命就是为了培养有觉悟的知识分子。”

## 一九七〇年

一月 “四人帮”公然篡改毛主席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光辉指示。《红旗》一九七〇年第一期发表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黑文，胡说：“强调‘正规化’的人，最反对把文科办成写作组”；紧接着《解放日报》一月八日发表题为《文科就是要办成写作组》的文章，《文汇报》一月十四日发表题为《写作组是造就无产阶级舆论人才的大学》的文章，公然宣扬“我们没这个系，那个系，”“我们没有这个专业”，“我们组自为战，人自为战，在和敌人面对面的斗争中，锻炼文攻的二百米内硬工夫。”

一月十三日 张春桥在上海工总司召开的座谈会上当着工宣队的负责同志说：“今年要招生了，不要招进来的是好的工人、农民，送进豺狼口被吃掉。如果不搞大批判，换了无产阶级的一顶帽子，重犯斯大林的错误，又说：“我们原来是小鬼，不要走向反面，成了阎王。”还对着“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徐海涛说：“……不搞得头破血流是不行的。”

三月二十九日 徐景贤在上海一个中学讲话时故意制造混乱，胡说：“大学生坏就坏在‘大’字上，要向小学生学习，向陈伯达学习。”

五月四日 张春桥在上海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五十

一周年大会上公开教唆青少年看黄色书，他叫嚷：“当前社会上黄色书刊流传很多，你把他全部收起来烧掉，那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把他锁起来，也不是个办法，还是可以拿去嘛！……对于黄色书刊，有些人拿不到桌面上来看，只好偷偷地看，你要禁也禁不了，与其偷着看，还不如拿出来大家一起看，看了就组织批判，进行消毒。”

六月 张春桥在上海召开的文科教育革命座谈会上，当工农兵学员提出试点班应派工宣队时恶狠狠说：“你们自己还管不了自己？都是党团员，学生支部也建立了，还管不了自己。”反对派工宣队。

七月一日 王洪文在上海无线电十七厂座谈会上公然篡改、诋毁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指示，胡说：“接班人五项条件，还要加一条参军参战”。

七月 张春桥在上海部分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汇报会上叫嚷：“我总想高校不要办得太多，办得少一些，面可宽一些，开起会来就这么一些人，就可以知道你们在搞什么，否则学校一多，开起会来一大批，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反正你要干什么，你就干，将来我不负责任”。接着就在上海大搞“拆”、“拼”、“迁”，破坏高校建设，造成严重后果。

朱永嘉在上海复旦大学文科座谈会上公开鼓吹儿童中心主义，胡说什么：“教师要明确，学校以学生为中心。你不以学生为中心，关门备课，必然主观主义，学生不欢迎。不要以不知为知，卖狗皮膏药，乱讲。”

十一月十八日 徐景贤在上海师大别有用心地提出：“十七年教育战线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修正主义。”直接反对周总理关于十七年毛主席教育思想的阳光照耀进学校阵地这个重要指示。

十二月二十三日 张春桥在上海第四届党代会大学组的讨论会上，胡说什么：“知识分子真难搞，特别是大知识分子，他们有学问，列宁骂：有学问的混蛋。”公然歪曲、篡改列宁的话。

（注：1908年2月7日列宁《给阿·马·高尔基》一文中是这样说的：“知识分子从党内逃跑的消息比比皆是。这帮混蛋跑得正好。党清除掉这些市侩垃圾，工人将担负起更多的工作。”）

张春桥公然反对批判“读书无用论”妄图篡改、否定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胡说什么：“读书无用论并不可怕，过了一年全部是读书有用论，我就不相信有人真不想当干部，资产阶级法权嘛。”

## 一九七一年

三月廿一日 徐景贤在复旦大学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革命大批判是大学的灵魂，教育的灵魂”。公然篡改毛主席提出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教导。

七月十一日 张春桥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

中，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鼓吹：“文盲多也是产生走资派的原因，知识分子成堆有问题，知识分子太少，少数知识分子就要指挥，大权就落到这些人手里，知识分子多一些好。”又鼓吹“读书做官”，说：“大学出来总是要进领导机关，这就是大学跟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大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不管怎样，大学毕业回工厂，也会成为工厂的骨干，有的当主任、书记，甚至到省、中央机关。”

七月廿六日 中央政治局讨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当念到毛主席关于“省、地、县委三级第一书记要管教育，不管教育的现象是不能容许的”指示时，张春桥冷嘲热讽地说：“他们可是找到一个上方宝剑”。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反对各级党委加强对教育的领导。

“四人帮”攻击周总理关于外语院系要加强对学生进行政治、外语和知识三个基本功训练的指示，胡说这是“搞外语特殊”、“业务挂帅”；并攻击说“从小学外语是搞修正主义”。（按：要加紧培养外语人材，要从小学开始学外语，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我国外交战线上斗争迅速发展的形势提出的，“四人帮”在这里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

## 一九七二年

五月十日 科教组召开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迟群在开幕大会上讲：“要看一看教育战线上到底是什么问题，要从实际出发，那里一个时期可能表现右，那里一个

时期可能表现极“左”，……通过斗争实践，认识贯彻正确路线，划线要具体。”把林彪极右路线当作极“左”。

五月 周培源同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应《人民日报》之约而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写成。《人民日报》邀集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的部分代表征求意见，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认为，当前发表这篇文章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理科的教育革命，有利于活跃教师的思想。《人民日报》准备发表。清样转到张春桥和姚文元手里，他们疯狂扼杀。一场围绕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就此开始。

（注：伟大领袖毛主席对自然科学及其基础理论一向十分重视。一九七二年，对一位科学家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的意见，表示了称赞。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对抓好基础科学研究，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搞好理科教育革命和培养基础科学人材等方面，都做了重要指示和具体布署。仅一九七二年以来的指示就有十多次，而且严肃指出：“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但是，“四人帮”为了搬掉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陷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对周总理的指示一不议，二不办，百般封锁，疯狂对抗。并一而再，再而三地诬之为“妖风”、“阴风”。他们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扼杀围剿周培源同志的文章，矛头就是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一九七二年以来张春桥多次对他的亲信恶毒诽谤周总理说：“他可以拿洋人的话（指杨振宁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话）来压我们，我也可以用马克思的话来压他们。”并给他的亲信下达黑指示说：“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

五月三十日 朱永嘉在上海市教材编写座谈会上别有用心地要把雷锋塔许仙娘娘的故事选进小学语文教材。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王知常紧接着对编写人员说：“你们又被许仙白娘吓倒了，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意义很深奥，有许多地方可以借用岳飞、秦桧，你总要树一个吧！语文不要考虑知识面，完全不必要，体裁不要花很多心思，写作技术主要靠多读文章。”“你们选的文章并不典型，有些文章姚文元同志亲自改过的，你们不选，有的文章我们认为并不好的你们都选了，无非是形容词多一些吧！”

六月二十日 迟群在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闭幕大会上讲话说：“林彪路线对教育战线干扰破坏很大，…各地情况程度不一样，不完全千篇一律，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具体分析。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把情况集中到会上揭发批判，有助于认识他们反动面目，反动路线，从右的，极‘左’方面的干扰破坏，使会议内容更加丰富了，大家回去后，要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一步。”又一次把林彪路线说成极“左”。

王洪文叫嚷：“林彪能够培养出周宇驰、于新野这样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充分暴露“四人帮”竭力网罗亲信、培植帮羽妄想步林彪后尘搞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张春桥居心叵测地说过，王洪文手下的“得力虎将”，“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从长远看，更要有这样一支力量。”

七月三日 朱永嘉在上海文科会议政治课小组会上插话说：“要把政治课教研组办成写作组，今后要把写文章多少作

为考核教师的标准。真枪实弹写文章，参加战斗。”

七月 对周培源同志《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张春桥、姚文元大耍两面派手法。一面对文章不正面表态，而提出要《人民日报》派人到天津和上海征求意见；一面又暗地指令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朱永嘉准备出击。朱永嘉立即用电话将张春桥的黑指示传达给复旦大学，并要学校连夜召集有关人员“统一思想”，罗织“罪状”，按张春桥的口径炮制“意见”。并嗣后亲自上阵督战导演，扬言“如果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就组织文章公开反驳。”写作组的头头说：“周培源是小角色，算个啥，还排不上号。”但是上海师范大学因事先未得到张春桥的黑指示，参加座谈的同志大胆地讲了真心话，对文章基本予以肯定。“四人帮”一伙当即斥责师大“右倾”，“对路线斗争不敏感”，并责令将座谈会记录上报。

迟群在批阅一份简报时说：“工宣队不能长期留在学校，以后是要撤的，这一点你们心中有数就行了，……”

张春桥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你们是工农兵学员，还要什么工宣队，你们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嘛！”

八月十二日 王知常在上海教育局语文组修改大纲学习班上，把姚文元与鲁迅相提并论，说《奇妙的逻辑》这种文章反驳修正主义论点，写得很好，象鲁迅《华盖集》的《诡辩的灵魂》就是这样的。他在选择语文教材时，极力推荐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



八月 上海朱永嘉在复旦大学讲：“周培源的文章有严重的错误，是一篇右的代表作，大家可以议论一下。”

九月十三日 “四人帮”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背着上海教育部门，偷偷在复旦举办工人大使培训班（于一九七四年七月毕业），妄图篡夺外交大权。

九月 上海在七一届初中毕业生中选六百人，培训外语人员，培训班设在复旦、师大、外语三校的“五七”干校内。张春桥说：“就是六百个都是修正主义分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张春桥在上海工宣队营、团级干部经验交流会上讲：“你们不是靠牌子（指工宣队）吃饭，把牌子摘掉。留下的，结合（进领导班子）的都要脱工装，没有结合的，统统回去。留下来的人要自己写报告，上级批准。”

十月六日 周培源同志《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张春桥、姚文元曾耍尽阴谋诡计妄图扼杀此文。《人民日报》在天津、上海各地征取意见后曾仍准备发表，“四人帮”以种种借口拖延阻挠。八月十五日姚文元批示：“文章是否马上发表或过一些时间较适宜，请你们继续研究。”然后又打电话给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说：“我和春桥同志商量的，文章发表了可能引起争论，你们如何收场。”（文章准备在讨论版发表，根本不存在“收场”问题。）后以正在批林整风不宜在《人民日报》发表为借口，转到《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发表后，上海市文教组随即炮制了一篇大唱反调的文章，《高校教育革命中若干问题的意见》

（即十条），并口头传达到学校。

十月十六日 徐景贤召集上海教育局有关同志研究建立局党委时说：“教育的问题中央很关心，文元同志说了，《红旗》发表的文章，观点不一致，清华、北大强调理论。周培源同志也发表了文章，发表的不一定都赞成，供讨论，头脑要清醒。”又说“基础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问题反映的少，过去搞专业的搞专业，搞基础的搞基础，不懂辩证法，走了很多弯路。”

徐景贤在上海市中小学教材工作会议上讲：“现在有人大叫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太差，有人在那里发表文章、出书。我们不可以认为报上的东西全部正确，全部正确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什么是基础理论，基础知识？最基础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有人一谈基础，就是数、理、化，脑子里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门基础掌握了，其他各门知识才能学好。现在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了解，使工作不能得到很大成果，我们现在给一些叫嚷基础的人搞昏了。”

张春桥在团的工作座谈会上讲：“不能讲抽烟就不行了，我也抽烟。讨论抽烟好不好，一百年也讨论不出结论。”“美国青年留长发，也有不同意见，辩论不清，有的认为留长发留得越长就说明越坚强，有的表示对现实的绝望。”

十月十八日 王知常在上海市委写作组谈语文教材时说：“即使搞十年运动，学生都成了文盲，打倒了刘、林就是胜利，是值得的。”“（北京和上海）两大派嘛，不一样就不

一样嘛。”

十月二十四日 张春桥在上海工宣队座谈会上讲：“我和知识分子混了多年，也没有被腐蚀下去。我知道你们水平低解决不了。”“工宣队进校四年多了，要长期留下来，四年多不算长期？三年五年我认为就是长期了。怎么永远领导学校？工人阶级要永远领导学校，这是指整个阶级。……工宣队名称还要不要？工宣队、军宣队全部撤走怎么样？……要起草一个文件，对四年来作分析，包括大中小学，撤还是不撤，什么时候撤？……撤要在第四个五年计划内。还要把工人讲师团考虑进去。”

姚文元在会上讲：“工宣队进校与以前有什么不同？关系怎样？搞教育革命还要依靠老的干部、学员、教师。……我们不能靠牌子，还是靠真理。”

徐景贤在会上讲：“工人与干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王秀珍在会上讲：“工宣队完成了历史使命。”

十一月 姚文元在一次讲话中说：“我讲的基础理论和他们讲的基础理论不一样，我们的基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

十一月五日 张春桥在召开上海市第六次团代会问题座谈会上讲：“毛主席提倡的，是努力的方向。但学生中没有一个是‘三好’的，一个青年总有缺点，如身体好（对一个戴眼镜的同志）你的眼睛就不行，身体真好？学习好，学习中总有缺点，好了没有缺点，坏的没有好的，这是形而上学，我看评三好不太好，还是一分为二好。”公然用折衷主义反对毛主席关

于“三好”的指示。

十一月十日 徐景贤在上海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上讲：“同志们不要求稳怕乱，追求安定的教学秩序……如果有一天恢复到过去的教学秩序，教材编得好好的，只要稍微备课就行了，学生很听话，乖乖的，纪律很好，家长满意，那末到了这一天，那也许是无产阶级教育灭亡的开始。”

徐景贤在上海市教材工作座谈会上讲：“有的学生几门文化课差，有没有？有的，甚至有的几门文化课都差。前几年，他们即使差一些，那也是有所失有所得。……这些学生在社会斗争中学到的东西非常丰富，并且能够把它们用之于实践。”

“前阶段，有的同志担心，流氓阿飞如此之多，好象不行。对这些我们震动、愤怒，这是正常的。但我们不了解人家到什么程度了。美国记者来上海，他们说，纽约有几万名警察，一个月还出现一千多凶杀案。最近苏修有船停泊在上海，船员下来后，个别的背着控制他们的领导，对我们同志说，你们青年真好！我们那里满街是妓女，我们光妓女对它没有办法，这是真话。因此，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工作的主流、成绩。这不是替我们吹嘘，而是鼓舞我们的信心，旺盛我们的斗志。”

十一月十一日 徐景贤在上海市教材工作会议上讲：“不要追求安定的教学秩序……现在都在变化、发展，这是最好形势。”“想搞一个制度，几个不准，就天下太平了？结果关系搞得很紧张。”

十一月十六日 朱永嘉在上海市中小学教育工作座谈会

上讲：“青年一代是可爱的，即使‘小爷叔’也是可爱的。”

（注：“小爷叔”系上海话，指流氓、阿飞。）

十一月二十日 张春桥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市团代会筹备会上讲：“那天听说有帮青年打群架，有一个青年人头被打破了，把衣服撕下来一包继续干，民兵来抓住了。……我想，这样的青年可能有长处，可能救火很勇敢，当解放军上前线，受重伤不下火线。”“别看这些人很调皮，打架，打起仗是很勇敢的，可爱的，能指挥军队作战。”“还有看书，坏书到处流传，就不准看禁书，不是引导青年看好书……还有些不好的书，越不给看，背后越要看，与其这样，还要大家一起看，看后开批判会。”

十一月 在上海市的一次大专院校、科技界有关人员的座谈会上，朱永嘉恶毒攻击说：“周培源的文章是复辟的信号，是党内又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并指责说：“听说你们师大对周培源文章是一片赞扬声，是不是啊？”“树欲静而风不止，风总是有的，到处有，有阶级存在就有风。对外面刮来的风都要辨别一下，是哪家的风，不要跟着别人犯错误。”

十二月八日 《文汇报》发表《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一文，批判十一月二日《文汇报》发表的上海师范大学物理系三位教师《怎样编好基础课教材？》一文，把主张重视加强基础理论的意见斥之为“否定新生事物”、“唯心论的先验论。”此后，便开足机器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该文围攻。这是“四人帮”为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而导演的一幕丑剧。他们要围攻周培源同志《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以掀

所谓的周培源同志的“后台”。但作贼心虚，又怕露出狐狸尾巴，于是便由其亲信朱永嘉以讨论为名，“启发”上海师大三位教师写了《怎样编好基础课教材？》一文，拿到报纸发表。先制造一个“上海的周培源”，然后开足机器，组织对“上海的周培源”的围攻。手段何其卑鄙！

十二月十一日 徐景贤在华东教材会议筹备会上讲：“基础理论少，有实践，补理论好了，总比理论一大堆，而脱离实际好些。”“你讲中山大学的事（指中山大学把化学系改成化肥厂，把生物系改成制药厂），我很感兴趣。为什么不可以一下子办一个厂呢？”

十二月二十日 徐景贤在六省一市教材会议上讲：“现在谁胜谁负的问题是否基本解决，在教育战线还未基本解决。”“有人攻我们理论之低是当代最低的。”“有些人写文章，有错误的还是要批判，不能人人高兴，那是周谷城的无差别境界。”

十二月二十三日 徐景贤在上海市教育局党委成立会上讲：“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把知识分子搞臭，这不对。知识分子臭一点可以，但不能太臭，可改造。知识分子要有一点自知之明。不承认臭，就改造到顶，就是死亡的开始，腐烂臭气冲天。我看还是承认臭一点有好处。”

十二月二十六日 徐景贤在华东教材会议筹备会上讲：“修正主义是一块臭肉，文化大革命前，教师象一群苍蝇叮在臭肉上。文化大革命象洪水，把臭肉冲洗了一下，苍蝇一下子

飞散了。后来又一点一点往上叮，……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好象皮球浮在水面，手一撤，就沉下去，手一松，又浮上来了。因此对教师就是要轰，就是要撤下去。”

《文汇报》在三版上发表《到实践中去求真知——桑毛虫肺炎调查的体会》等一组文章和题为《显微镜下看不到的广阔天地》的“评论”，打着重视“群众的社会实践”的幌子，恶毒攻击周总理。这一组文章由“四人帮”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余党亲自布置，由王洪文的心腹亲笔改定。在“评论”中他们恶毒地把周总理抓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诬蔑为“唯心论”、“修正主义路线”，叫嚷这是一场两种世界观、两条路线的斗争。

十二月 张春桥在讲到培养无产阶级的专家问题时说：“姚文元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家，但他很忙，无时间著书，如果有一批就好了。”

## 一九七三年

一月十日至二十二日 华东教材会议召开。徐景贤在会上讲：“领导同志（指“四人帮”）提醒我们要像江青同志抓样板戏一样抓教育革命。”“大部分人感到不舒服，教育革命就成功了，大部分人感到舒畅，革命就失败了。”

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市组织工作会议上王秀珍说：“回去的工宣队，要注意培养，也可多留一点培养女大使。”徐景贤说：“要注意从教师中培养付校长，复旦搞了，其他学校也

可根据实际情况办。老干部可以当参谋，不一定要官复原职。”

四月 国务院下达有关大学招生的文件。文件中明确指示：要坚持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文化考查。文化考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被推荐者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指出要防止“分数挂帅”。文件是由敬爱的华国锋同志和国务校其他领导同志批准的。“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恶毒攻击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旧教育制度的“回潮”，是“反攻倒算”。

四月二十七日 华东地区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上，徐景贤说：“华东地区文化大革命前后在比较，文化大革命前中学五千六百所，现在是二万八千二百所，那就是五倍。五倍是不是一个质量。……中学生文化大革命后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将近七百万。五倍的中学，七百万的学生，就是质量。”

五月五日 《文汇报》登载“工农兵怎样搞好上、管、改”的讨论专栏的小结《坚持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一文。批判所谓“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五月十日 朱永嘉在上海市教材工作会议上说：“加强基础课，首先是要革命，要改造基础课，批判旧的基础课，理论联系实际，和专业课结合，在实践的基础上加强，向理论方面发展。”“加强基础课是要沿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这样的方向去加强，不是丢了方向，走老路”。

六月 上海市委写作组王知常在审查教材时讲：“有人说现在有两大派，即南派与北派，我们还要按照我们的搞。我问过中央负责同志（指张春桥），他说是两派，是不一样的，人家犯错误，你也跟着犯错误吗？”

七月十日 毛远新在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座谈会上，发现了兴城县考生张铁生在考卷背面给领导写信一事，如获至宝，下令当晚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急送来。信一到手，立即决定要《辽宁日报》加编者按语发表。当时有人反映张铁生在信中打击别人，吹嘘自己，是个“大学迷”。毛远新说：“不要孤立地看一句话两句话，要看主流嘛，要看这封信发表后起的作用。”他还抓住文化考查大作文，疯狂咒骂说：“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

七月十九日 《辽宁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编者按语中吹捧张铁生“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注：这是“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炮制的反革命政治骗局。七三年四月，国务院下达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文件，其中规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又红又专”的教导，在群众评议、推荐，政审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文件发下不久，毛远新窜到北京，与迟群密谋。他们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要“辽宁拿出点材料来”。毛远新回去后，胡说什么

“文化考查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权”。于是便抛出了这块他自认为是“有棱有角”的“石头”。张铁生在兴城县参加考试，这次考试既不是突然袭击，也没出偏题怪题，并且是可以翻书的开卷考试。张铁生并没有反对考试，事先经过复习，也没有交什么“白卷”。在那封“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信中，他一面标榜自己“自我表现胜似黄牛”，一面辱骂其他被推荐来的工农兵青年是什么“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为个人努力”的“大学迷”。而且“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以达到他上大学的“自幼的理想”。张铁生根本不是什么反潮流的英雄，倒是一个打击别人吹嘘自己的“大学迷。”

七月 迟群授意《教育革命通讯》第七期发表署名方迅的文章《张铁生同志的信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大叫“这是（指文化考查）破坏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贯彻执行，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扑”。是“沉滓的泛起”。

（注：张铁生的假典型抛出后，“四人帮”及其黑干将便开动宣传机器，借此大造反“复辟”，反“回潮”、反“倒退”、反“错误潮流”的舆论。“十大”以后，他们又接过“抓大事”、“反潮流”等革命口号，加以歪曲，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反所谓的“复辟”、“倒退”，制造混乱，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击一大批中央及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干部。其中以清华、北大的内部刊物《清华战报》、《新北大》的文章，在掀起这场反“回潮”的恶浪中影响尤为恶劣。）

张春桥攻击文化考查说：“这样搞法，把无产阶级寄予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

七月廿八日 “四人帮审查《园丁之歌》影片。江青说：“园丁应该是共产党，怎么讲成教师、知识分子呢？把教师作为园丁，党呢？摆在哪里去。”“没文化怎能将革命重担来承当，这句话问题就更大，简直是反攻倒算！”“过去老干部大多数没有文化，照样能够参加革命。”

八月二日 《文汇报》转载《辽宁日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此后，《文汇报》开辟“选什么样的人上大学”讨论专栏，大造舆论，围攻正确意见，攻击所谓“回潮”、“倒退”。

八月 谢静宜在关于北京市教育局起草的北京市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报告稿的谈话中说：“对这个报告我不感兴趣，没有楞角，不解决问题。这次大会要突出讲张铁生反潮流精神，讲话要一针见血，能刺痛一些人，让大家坐不住，浑身冒汗。”

八月三日 迟群在北大党委扩大会议上讲：“我在清华说过，象这样的大学过两年就要抓一次右派。特别是北大、清华、复旦这样的大学。”

八月四日 迟群在招生工作会议上讲：“打了一百分，搞修正主义，这又有什么用呢？打了〇分，但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却很清楚。哪个有用呢？”

八月八日 迟群在招生工作会议上讲：“张铁生同志的信是敢于造反的一封信。新事物的出现总要遇到非难和攻击。我们就要替这种人撑腰。”“六八、六九、七〇届初中毕业生，他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上了阶级斗争这一门主课。这对他们是个深刻的烙印。就是交了白卷，但是他们懂得大是大非，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

八月十日 谢静宜找北大、清华开会谈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时说到关于《红楼梦》的评论研究时说：“《红楼梦》只看故事没多大意思，要抓一些人的错误观点进行分析研究。”

《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在编者按语中说“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九月 四届人大筹备期间，“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立即着手网罗党羽，安插亲信。王洪文、张春桥叮嘱他们的心腹“不要放过当前的时机”，要选派“真正能起作用的干部”，占领要害部门，“要把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干部送到中央，闹它个天翻地复。”

九月八日至十一日 迟群背着党中央和国务院以科教组名义召开教育战线开展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负责同志及一些学校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个会就是“三箭齐发”的“一·二四”“一·二五”大会的前奏。借所谓批孔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以及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迟群在会上不仅大谈“走后门”问题，还大谈招生问题。并别有用心地说：“我们首先要批林，但是孔

子也要批，刘少奇、林彪用孔子的反动思想毒害人民，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所以批孔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现在批，以后也要批，不太容易。……我们抓上层建筑，如不批孔，这件大事，我们就没有抓好。”还说：“希望教育战线的同志要抓大事，甩开一些日常事务，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要读马列，毛主席的书、研究大事。不要只看文件，那些文件是经过一修再修，专门给你看的。”“希望各地不要变成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地方，希望水泼得进，针插得进。”

九月二十日 王洪文接见总工会常委时插话对业余工大说：“你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骂一顿臭知识分子，不要以为风平浪静了，没有事了，首先一点，是同志们不要轻易相信他们。”

继《辽宁日报》抛出《答卷》黑石头之后，上海徐景贤见了附在一份简报后面的上海师大中文系毕业生刘丽华的《谈话记录》，认为也找到了一块石头，既不经核实，也不与师大党委商量，便写了批语：“读了此件，很受教育，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作斗争是长期艰巨的任务，建议文教组将此件加按语印发高等院校，请革命的师生员工认真讨论。”于是上海高校便开始了一场所谓批判“智育第一”“和资产阶级传统势力”的《谈话记录》讨论。

九月二十七日 上海骊山中学一名青年教师向学校党支部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在这份思想汇报中，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在教育战线搞的一套表示不满，批判了他们的某些言论，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在揭露“四人帮”狗

头军师张春桥篡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教育方针的问题时，这位教师指出：“教育方针中的劳动者应当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应当是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然而，有人却恰恰把‘劳动者’之前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定语取消了，这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歪曲和践踏。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该校一位党员表示赞同这位教师的观点，而且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张春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吧？”“他们执行的路线难道没有错误吗？”政治流氓王洪文在一份“情况报告”中看到后，立即做了黑批示：某某等“一伙完全是右派。有的话就是帝、修、反的，有的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言论，应充分发动革命师生进行批判。”“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马上转批：“按照王洪文的‘批示’办”。另一个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余党在骊山中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说这份思想汇报是“教育战线上一股右倾翻案的思潮……，他的言论跟孔老二、刘少奇、林彪是一脉相承的，要提高到否定、抹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加以批判。”这两位教师在“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迫害下，不断受到批斗，被停止党团组织生活，停职检查，靠边劳动，还被责令到里弄和工厂接受批判。《文汇报》还登了骊山中学批林批孔联系实际的所谓“经验”。致使上海市中小学出现了一股掀“某某某式人物”的恶浪，闹得乌烟瘴气，影响极坏。

十月二十三日 迟群在理工科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总结会上讲：“历史上凡是反动统治阶级，维护旧制度、开历史倒车、搞复辟、行将灭亡的人都是尊孔的，都是反秦的。外边有谣传，说教育战线批孔会犯了错误，要降调了，那会是正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科教组没有降调，谁降调谁负责。反对批

孔，就是复辟。”

(注：七三年九月八日至十一日，迟群背着党中央和国务院，以科教组名义召开批判孔子座谈会，这是“三箭齐发”的“一二四”、“一二五”大会的前奏，借批孔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以及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会后受到周总理的批评，迟群在这里仍继续对抗。)

十一月二十日 张春桥在共青团上海市第六届代表大会预备会上讲话说：“那些打群架的、戳刀子的，将来为我们打仗，可以成为很好的战士。”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上海徐景贤在张春桥直接指挥下，将刘丽华《谈话记录》大段修改后(将原稿删掉三分之一以上，增加了四分之一左右)，在《文汇报》及《解放日报》上发表，并要教育、卫生、文艺、科技、体育、新闻、出版等许多战线开展讨论。讨论持续三个多月，共发表三十组一百七十篇文章。徐景贤说：“最近向中央领导(指“四人帮”)作了汇报，春桥、文元很支持”。“这样修改，实质问题有了，有些删掉，有些改正是领导同志(指“四人帮”)指出的。”

徐景贤在上海大讲：“这次就是借贵方一块宝地，一个同志的谈话，把资产阶级势力扫一扫。”

十一月二十五日 毛远新在辽宁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你教的学生首先是要有社会主义觉悟，否则他怎么能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呢？有的同志对

这点不理解，他不要两头，只要中间，就是只要‘有文化’好象学校就是只教文化的。那么请问，如果这样，我们的学校和苏修的学校有什么区别？和美国的学校又有何区别？”“有些同志天天在那里批评教育质量太低，可是很少去谈如何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怎么鼓励学生成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工人、农民等”。

十二月五日 迟群、谢静宜在接见黄帅时说：“我代表国务院、代表八亿人民支持你！”“一个很小的小学生提出了一个大问题”，教育战线被“资产阶级右倾复辟势力”统治了。“你黄帅敢提意见就是最好的革命纪律……”迟群说：“你的老师再坚持错误立场，就把他打成右派。”谢静宜给黄帅所在小学的党支部打电话说：“要有棱角，对班主任老师不要太手软了。”但她在背后又当面称赞那位教师说，你那个批语写得“不错”，“我们从来不认为”你这个老师不好等等。

十二月五日至七日 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第二次学报工作座谈会，迟群在会上说：“有些流言要警惕，如说什么南北之争？这是反革命舆论，制造分裂。”“有的说批林批孔搞过头了，要追问是从哪里流传出来的，你那个地方批孔批得怎样？怎么叫过头？”

十二月十二日 《北京日报》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了编者按语。

(注：“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两个黑干将把一个小学生和教师的矛盾大肆渲染，报上点名，全国讨论，称之为“两个阶



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是“坚持复旧还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方向问题”。借批“师道尊严”把大棒抡向广大教师，致使一段时间内，学校中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无政府主义猖獗，阶级敌人乘机活动，学校秩序和公共财物遭到严重破坏，学生受到严重的腐蚀，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干扰“十大”精神的贯彻落实，扭转批林整风斗争大方向，以求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十二月 科教组召开的九省市教育革命汇报会上，“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打退资产阶级右倾势力的猖狂进攻。”还抛出黄帅这个假典型，借此宣扬“天才论”，挑拨师生关系，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教师。迟群在会上叫嚷：“希望各地宣传敢于反潮流的小将”，“黄帅说的问题，在我们学校和家里都有。”责令《北京日报》“要活泼起来，及时反映出来，”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向顽固派反击。”

十二月十六日 一九七三年十月至十二月，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搞了所谓反击右倾回潮的“三个月运动”，疯狂镇压革命群众，把不少坚决贯彻落实“十大”精神和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指示的革命干部、革命教师打成“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右派”、“顽固派”、“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反革命”等等，罪恶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十二月十六日晚，迟群在清华全校党员大会上作了长达数小时的《关于目前运动的几个问题》的黑报告，胡说什么这场运动“是刚刚过去的大革命的继续，反映了大革命之后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新形式，反映了整个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形式和特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盘根错节的旧清华封

资修残余势力作斗争的继续，是工人阶级开进学校五年来占领与反占领、改造与反改造斗争的继续”。运动的方向就是“要联系学校当前实际，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以及它的代表人物。”

十二月 科教组召开的九省市教育革命汇报会上，“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打退资产阶级右倾势力的猖狂进攻。”还抛出黄帅这个假典型，借此宣扬“天才论”，挑拨师生关系，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教师。迟群在会上叫嚷：“希望各地宣传敢于反潮流的小将”，“黄帅说的问题，在我们学校和家里都有。”责令《北京日报》“要活泼起来、及时反映出来，”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向顽固派反击。”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在编者按语中吹捧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煽动整个教育战线，以此为典型，去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四人帮”及其干将制造的这个打击广大干部和教师、破坏教育战线的“典型”流毒全国。

## 一九七四年

一月七日 “四人帮”诬蔑无产阶级革命派为顽固派。迟群在九省、市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上讲话，猖狂向革命派进攻。他说：“张铁生同志那封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再有黄帅……那也是一个敢于反潮流的”，“假如说在文化大

革命之前出现这样一部分问题，揭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能不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向这种顽固派作反击呢？没有这样一支力量，岂不是复辟了吗？没有这样一场斗争岂不是资产阶级又专了无产阶级政了吗？”

一月 七三年河南省教育局发现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一女学生，因为教师讽刺、打击而含愤自杀的事件，立即进行了解决处理。国务院科教组普教组的同志拟发一简报，以引起各地重视。上报迟群，竟被他压了两个月之久，一月初，在经办同志催问下，批了“是否发简报还要斟酌。”但后来他却反过来拿这件事作为炮弹，上整中央领导同志，下整广大教师。

一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鼓吹黄帅“反潮流”精神的通讯说：“这次黄帅批判师道尊严，《北京日报》马上刊登出来，《人民日报》又写了编者按语加以刊登，领导上这么重视，说明两条不同路线对群众的两种不同态度。”并说：“在《北京日报》发表黄帅的信、日记摘抄和编者按的一个星期之内，全市许多中学就采取各种形式，表示向修正主义开火的决心，并摆出一些学校在‘师道尊严’、‘智育第一’、考试制度等方面出现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些回潮现象。许多小学生也用小字报、写小条、写信、口头等办法揭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和影响……”

一月十八日 毛远新在辽宁关于批孔问题座谈会上讲话，猖狂破坏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他说：“黄帅的信反映怎么样？小学要把信当课讲。”“大学教授的师道尊严比中小学更厉害，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他们是王道、霸道并用者。”

“辽大可以写写文章引林彪、叶群黑笔记的东西，不写出处，把批孔同批回潮结合起来。”“文教、宣传抓的不好。张铁生的信抓这么久，抓住这个进行教育革命不够。”“文教组的同志对张铁生的信都同意，表示双手赞成，我还是高兴的，就是抓得不得力，抓住这个箭，推动教育革命不够。你们要一分为二。”“文教组敏感倒敏感，但抓不住要害，再一个不深入。特别对教育战线，斗争性也有，但斗不到点子上，大的抓不住，如几封信应大作文章，抓的不够狠。黄帅的信挑起一场激烈的辩论，在中小学震动很大，对张铁生的信抓得不够。你们应当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做的不够。”他猖狂地影射攻击周总理和其他革命老干部说：“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九、十次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可是现在社会上有那么一股劲，就象孔夫子到处辛辛苦苦替打倒的奴隶主阶级招魂似的，不过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替刘少奇、林彪和所代表的地主阶级招魂，有一股回潮。这股劲不小，直接对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新生事物，教育革命是首当其冲的。”“深入批林结合批孔这场斗争的意义提高了没有？我们也不讲假话，直言不讳地说，提出二千年前的死人是整活人的。”

一月二十五日 “四人帮”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会上，突然抛出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作为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进攻的炮弹。谢静宜讲话说：“江青同志有一天晚上突然找我们去了”，“其中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说到河南去，有一个马振扶公社，……有一个中学，出现了一些问题。”迟群说：“那个地方在反攻倒算，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击倒算，在翻文化大革命的

案”，又说：“这一次江青同志叫我们出去，同时叫我们顺路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河南的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个中学所发生的事情，逼死了一个小女孩，十五岁，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

同一会上，“四人帮”三箭齐发，大搞反“走后门”。

一月三十一日 “四人帮”继续就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大做文章。迟群不经过河南省，直接给南阳地委打电话说：“马振扶中学事件，我已经给中央领导同志（指“四人帮”）汇报过了，认为很严重，江青同志很气愤，王洪文副主席讲，对罗、杨二人要判重刑，叫你们研究一下。”

迟群电话通知各省市教育部门说，要把“走后门”“作为当前深入批林批孔、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实际的一个重要内容”，“切实抓紧抓好。”

一月 毛远新在一次青年座谈会上赤裸裸地煽动说：“我们这个时代是新旧交替。”

谢静宜在一次会议上大吹特吹江青会“抓大事”、“抓典型”。说：江青“最近又抓了好多关于教育革命这方面的典型，把教育革命搞得轰轰烈烈的。”

迟群控制的《教育革命通讯》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一期转载《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发表黄帅来信和日记摘抄时所加的编者按语，并刊登新华社通讯，鼓吹黄帅的所谓“反潮流”精神，大反“师道尊严”。

《教育革命通讯》同期发表署名秦怀文的文章，大肆攻击革命领导干部是什么“业务党”。文章说：“这两年‘业务党’的幽灵在有些人身上又还魂了，汇成一股逆流”；“它不仅存在于党外，更危险的是存在于党内，存在于某些党员干部身上。有的地方不抓大事，教育革命推不动，原因就在于此。”

二月十一日 《人民日报》开辟《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专栏，鼓吹“黄帅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同时在头版头条用楷体字发表署名黄帅的所谓复内蒙王亚卓的公开信，并加编者按说：“这件事情反映出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先是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王文尧、恩亚立、邢卓等三个青年同志用王亚卓的笔名写信给黄帅，指出她不去批判修正主义而把矛头指向革命教师，方向是错误的。黄帅收到后，由别人代她写了这封所谓复信，连同来信一并送交谢静宜、迟群。迟群在来信上批：“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完全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语言。”《人民日报》加了按语送姚文元审批，鲁瑛为此还写了亲笔信。姚文元批：“拟同意发表黄帅驳王亚卓的公开信，（王亚卓的信主要论点已有，可不发）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有力。即送洪文、春桥、江青阅批。”姚并在《人民日报》上加了“重温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一句。江青批：“我改了标题，建议版面排得突出些生动活泼些。”原题是《黄帅复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改题加了“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点出了单位名称。鲁瑛在复信上加了“你的话与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多么相似”。《公开信》发表后，王文尧等三同志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

毛远新窜到鞍山市，大抓所谓“复辟”的典型。他抓了两个中学当作“回潮”的典型，破口大骂：“你们教师就是教唆犯”，“你们教育局就是最大的教唆犯”。并且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会议对鞍山市委大吹其“氧”，他层层吹氧烧下面，一双眼睛盯在上面，说：“要把火引到上边去”，“不斗争，现代孔夫子上台，大家都得当少正卯！”

二月二十日 毛远新在鞍山的一次讲话中说：“大家都舒服，有人不舒服。知识分子舒服，工宣队就不舒服。”

江青亲自出题目要“梁效”写一篇《孔丘其人》，她还特别交待，文章要突出两条：一是孔丘稍一得势就杀人，杀少正卯；二是孔丘到处碰壁。迟、谢连忙动员“梁效”全部人马突击这个“紧急任务”，并强调：文章要有“针对性”，要有“强烈的现实感”，要在“其人上把文章作足，画好某个人的像；孔老二要“虚构，不要太实，提林彪不仅仅是林彪”。几经易稿黑文成就，迟群称赞“可取”；江青夸奖写得“生龙活虎”；姚文元也称赞写得“生动活泼”，下令在《红旗》上立即发表，恶毒攻击周总理。

《教育革命通讯》一九七四年第二期发表《评论》，题为《不批孔就是不批林》，大肆鼓吹张铁生、黄帅等“反潮流”，说：“广大工农兵和张铁生、黄帅……等一大批反潮流的革命小将，正冲锋在前。让我们学习他们的榜样，以‘不管风吹浪打’，‘万里长江横渡’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乘胜前进！”同时还歪曲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方向，三箭齐发，大搞反走后门。《评论》说：“请问：有的地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

辟造成严重恶果，这样的实际难道不应该联系？那些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反攻倒算、攻击教育战线一系列革命变革的行径，难道不应该联系？那些‘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难道不应该联系？”

《教育革命通讯》同期发表署名“方迅”的《考教授有感》一文，吹捧张铁生交白卷。文章说：“张铁生同志在去年大学招生文化考试中交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他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向修正主义考试制度的复辟勇敢开火，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师生的齐声赞扬。”“张铁生同志似乎是交了一张‘白卷’，但是他对整个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的答卷；他在反对修正主义教育复辟的反潮流斗争中，交了一份很有水平的答卷；他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三大革命斗争中，交了一份使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三月二十九日 上海《文汇报》《批林批孔，把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革命进行到底》专刊发表文章，鼓吹“学生自己走上讲台，自己教育自己”。

江青对北京市永乐中学教师×××来信不作调查，不问事实，批示：“建议立即对此事进行调查研究，严肃处理。北京市已有几个学校实行法西斯主义，让坏人专了学生的政。打、骂、死、活听之。是在社会主义中国？还是国民党的台湾？建议北京市委抓紧批林批孔这个纲，抓住典型，是要夺权改革的问题。师道尊严，也要彻底批判，这种残害青年的败类，应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歪曲事实，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

盾，大整学校的干部和教师。在江青抛出这些“批示”后，几个月之内，学校教学秩序被破坏，校内外阶级敌人大肆活动，拼命腐蚀青少年。北京市一些学校发生了学生砸破学校教室的玻璃、破坏桌椅的现象。仅安德路中学就砸碎玻璃四百多平方米，砸毁课桌椅四百多套，砸坏学校教室、电器等大量设备，致使国家财产损失达一万元之多。谢宜对该校负责人说：“书记同志，这是多么可爱的小将啊！打碎几块玻璃有什么了不起，有人想借此否定批林批孔。”

《教育革命通讯》一九七四年第三期发表署名“方迅”的文章，题为《弄潮儿向涛头立——赞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革命小将》，把张铁生等吹捧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文章说：“这场战斗中，打头阵的大多是一些年轻人”，“张铁生、黄帅”“他们是革命的‘弄潮儿’”。 “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光辉的未来。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有了这样的接班人，革命的航船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所向无敌。”

四月三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四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影射攻击周总理的黑文《孔丘其人》。

四月十一日 毛远新在辽宁省教育战线工宣队工作会议上讲话，大肆攻击各级革命领导干部，破坏教育革命。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不怕”，“更重要的是敢于向各级党委，包括省委在内、各级教育部门的错误路线坚决斗争。” “我们省有个张铁生，写了一封信，我们发表了，很多人就骂，骂得可难听了，什么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骂我们省委不是捡到一块黄金，而是捡到一块烂铜渣子。可见张铁生的信打中了他

们的要害。” “去年在常委会上有人提回潮还说高，我说，你说高，我说有反攻倒算的味道呢”！他攻击学习社会主义文化，歪曲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说：“学校是讲文化，不要两头，只要中间，这种做法，这条路线，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所谓的不要社会主义觉悟，只讲文化，实际就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人。” “我们的学校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学校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恐怕就在两头，一个是有社会主义觉悟，一个是劳动者，就从这两点上，我们就体现了我们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攻击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你稍微一放手，他就按资产阶级那一套干，你一批评他就消极怠工。” “现在，我们遇到的教师也是这两手，要末坚持资产阶级偏见，一批判，就躺倒不干。” “林彪若是复辟了，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怎么想的？知识分子就无所谓，你复辟，我照样上课，讲我的ABC，他还觉得资产阶级那套教育很好，成名成家，那一套东西比在工人阶级手下天天讲改造舒服得多。”他鼓吹破坏教学秩序，说：“象黄帅敢给老师贴大字报，他就叫‘乱’，我们说就是要乱，乱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 “他们攻击教育革命无非是两条，一曰乱，二曰低，合起来是糟。以乱为理由，恢复师道尊严，把学生培养成小绵羊；以低为名，搞智育第一，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五分加绵羊”。“当然，对乱要作阶级分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叫我们打破了，他们就叫乱。黄帅出大字报，他们也叫乱。另一方面也要承认，有些学校纪律乱，有的学生犯罪，有什么奇怪？十七年有。一个时期为什么严重些？对原因的看法不一样。我们说，正是你资产阶级的两手，一是怠工，一是坚持资产阶级偏见造成的。”关于质量问题，他说：“至于说知识质量低了，我们把烦琐的内容砍掉了，他们说低了。当然也

有的学少了，谁造成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造成的。一是资产阶级偏见，一是怠工，他们不好好教，他们过去用学而优则仕、成名成家等资产阶级的思想刺激学生，现在批判了，有的人不会用新办法，也有人不愿用毛主席所教导的新办法。”

四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第三版《城市的小学及中学应当如何办（一六九）》专刊，发表各地来稿，围攻“王亚卓”，继续大反“师道尊严”。

《教育革命通讯》一九七四年第四期发表《评论》，题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学校》，就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攻击教育革命。文章说：“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不是一件孤立的逼死人命的事件，它是教育战线上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典型，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全面复辟的典型。迫害学生致死，只是复辟恶果的一个尖锐表现。”按照这种谬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一九七三年就已经“全面复辟”了。

一九七四年春，迟群抛出一个所谓“改革城市中学教育的建议”，主张学生中学毕业时达到二级工水平。破坏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对抗《五·七》指示，大搞实用主义教育。

五月 毛远新控制的《辽宁教育》一九七四年第五期发表文章，题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充分发挥工宣队的政治作用》，再次攻击学习基础理论。文章说：“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有的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鼓吹理科就是要搞基本理论，实际就是重走‘三脱离’的回头路。”

迟群在科教组办公会上大讲《乡党篇》，并阴阳怪气地对别人说：你是大学毕业生，你能看懂吧。并给科教组每人发了一份《从〈乡党篇〉看孔老二》、《孔丘其人》的黑材料。

六月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对于校外语培训班学员讲话说：“你们是外培班，主要是学外语，否则就办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训班。”“你们要好好打基础，二年后你们上大学。”这是“四人帮”猖狂反对教育革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教育的明白自供。

江青两次接见“梁效”说：“现在的文章有个缺点，就是不讲现代的大儒”，现代的儒“有学者的儒，有政治的儒”；“蒋介石是大儒，党内也有大儒。刘少奇、林彪是大儒，党内还有大儒。不然为什么搞这么大的运动？”

七月十二日 江青对北京市二十七中学一个教师来信批示：“中学，甚至小学的批林批孔都应抓紧些。要抓典型，以点带面。如不及时抓紧，对青少年、儿童不利。《三字经》之类的东西，就是针对少年、儿童编的。我们对这个问题不重视，不能使一个人从儿童、少年就粗知一点马克思主义，敢于批孔老二，值得深思。”她要中、小学生批判根本没有读过的《三字经》，妄图把批林批孔引入歧途。从此，在一个时期之内《三字经》、《神童诗》、《女儿经》等等包含大量封建毒素的东西在青少年以至儿童、居民中泛滥起来。

七月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长篇报道，题为《张铁生上大学》，对反革命分子张铁生大肆吹捧。

《教育革命通讯》一九七四年第七期发表《短评》，题为《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搞好高校招生工作》，宣传取消文化考查，破坏国务院关于招生工作的指示。《短评》说：“文化考查知识分子说了算，健康状况单纯靠医院的做法必须改变。”

八月二日“四人帮”开始公开围剿《园丁之歌》。《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湘辉”的文章，题为《评湘剧〈园丁之歌〉》，给这出戏加上“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宣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它歪曲党的教育方针，兜售‘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的黑货；它反对‘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鼓吹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等莫须有的罪名，把矛头指向关怀过这部影片的华国锋同志和称赞过这部影片的毛主席。

八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初澜”的文章，围剿《园丁之歌》，题为《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文章罗列该剧几大“罪状”，宣称：“陶本来不错”，“他的行为本身，实际上就是对修正主义路线的一种抵制和反抗。但是剧本却硬说他‘错’。”

八月 姚文元看了围剿《园丁之歌》的文章，加批语说：“此剧的路线及其歌颂的人物都是错误的。”

八月十五日 “四人帮”上海余党徐景贤在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上讲话，鼓吹用政治运动代替政治理论课。说：“有人说政治理论课上得少了，怎么少了呢？批林批孔不是最重要

的政治课吗？”“应该说这半年来，我们上了最生动最深刻的政治课。”

《教育革命通讯》一九七四年第八期开辟围剿《园丁之歌》专栏，题为《批判坏戏〈园丁之歌〉》，编者加按语说：“湘剧《园丁之歌》是一出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人民日报》已发表《评湘剧〈园丁之歌〉》、《为哪条路线唱赞歌？》两篇文章。在当前深入发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联系教育战线的斗争实际，发动广大师生分析、批判这出坏戏，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文化教育领域的胜利成果。”

八月二十四日 张春桥破坏《五·七》道路，搞实用主义，在一封信上批示：“知识青年对函授如此欢迎，当然是好事。希望你们坚持下去。希望管教育的同志们考虑一个问题：我们中学的教育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缺门留给函授解决，为什么不可以在学校就学到这些本事呢？值得研究一下。”

十月二十三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敢于反潮流的一代新人谈——话剧〈小将〉中杨波的形象》，鼓吹学生交白卷。文章说：“独幕话剧《小将》，通过红卫兵小将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现象的斗争”，对“《园丁之歌》，是一个有力的批判。”该剧“为了突出小将杨波的‘五敢’精神，剧本设置了几个回合的斗争。在‘数学竞赛’中，杨波交了白卷，退出考场，并提出‘不做分数的奴隶，要做学习的主人’。”

江青要求把《神童诗》编入中学课本，向青少年放毒。她在

一九七四年国庆期间对中小学教材改革的“意见”中说：“中、小学历史、语文课本，应该检查一下，有必要改写。有些教材没有体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的精神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论语》可编入大学教材，《神童诗》可编入中学课本，作为反面教员，从小培养敢于批孔老二的战斗精神。”

十一月二十八日 毛远新在辽宁高教会议上讲话，叫器要培植一批青年亲信放到各级教育领导岗位上，为“四人帮”篡党夺权作组织准备。说：“我建议文教组能否把那些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头头，后来下乡接受再教育，经过锻炼回来当了教员，表现很好的，这样年轻人有一大批，把他们集中起来办个学习班，学路线、政策，加以提高，然后回去当各级领导。二十几岁的人，我就不相信他不能当中学校长。大学也需要这样。”“大学里头工人、工农兵学员，还有中小学有一大批积极分子，想什么办法把他们培养提高。”“二十几岁，三十来岁的人，能不能当校长？我就不信他们比五、六十岁的人差。让他们掌握方向，教给他们方法，当校长、支部书记为什么不可以？沈阳中学，每个中学都有这样一批积极分子。难的是领导思想保守。把这些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分成组，哪里出问题，就派他们去调查研究，提出解决办法，从这里就能看出他们的水平高低。半年毕业以后，我留它百分之三十任命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可以不可以？我看是可以的”。他在讲话中直言不讳供认，树立假典型张铁生是为了反对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革命领导干部。他说：“张铁生的信发表以后，想写一篇文章，后来压下了。不是文章的观点有问题，而是觉得光从招生角度讲不行。因为大家是从各种角度来的，这样写有空可钻，说我们不要文化，不要科学啦。”“张铁生信的发表，是省委

常委决定的，我不过提了个建议，抓住张铁生这块石头想打人就是了，这块石头是有棱有角的。

十一月三十日 “四人帮”反对学生掌握专业知识，胡说学生一掌握专业，必然走资本主义道路，迟群在科教组接见参加“部分省市教材改革座谈会”的各省市有关负责同志的座谈会上讲话说：“搞专业化就会出现‘个人开业’，走资本主义道路（河南一个学生不下乡，自己开业，挂牌修理机械，每天挣十元钱）。”

十二月二日 《人民日报》开始宣传辽宁朝阳农学院经验。本日头版头条刊登该报通讯员和记者合写的报道，题为《农大毕业当农民好——辽宁朝阳农学院实行“社来社去”的调查》。编者加按语说：“实行学生‘社来社去’为当地培养了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懂得农业科学的劳动者，这是……又一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十二月四日 毛远新窜到辽宁省哈尔套公社敖汉大队召集几个青年座谈时别有用心地说：“青年人，一是敢斗，二是敢干，有了这两条，接班人的条件就够了”。还说：“象这样的青年，可以大胆提拔，大胆使用。”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规定。

十二月十日 迟群谈对《教育革命通讯》一九七四年十二期《破“因循守旧”》一文的意见说：“要有一点精神，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干什么？就是破‘因循守旧’。……破‘因循守旧’是个大题目，要从政治思想上写。矛头所指是一小撮，



……把列宁的‘其重无比的大山’的语录加进去。要讲‘因循守旧’的危害性，是社会主义的敌人。”

十二月十二日 迟群在北京语言学院党代会上讲话，号召批“因循守旧”，说：“教育革命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批因循守旧”。

两校大批判组王世敏交代，“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是“四人帮”通过迟群、谢静宜直接控制的反党夺权舆论工具。三年来，共发表了约168篇文章。其中，由江青点题的有《孔丘其人》、《批“因循守旧”》等。所谓《“批因循守旧”》，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

《教育革命通讯》一九七四年十二期发表署名文章，题为《破“因循守旧”》。文章说：“旧学校是脱离实际搞关门教书的；现在……实行开门办学，‘出出进进’，‘上上下下’，有些同志便觉得不舒服了”。“十八世纪著名的发明家瓦特，在成名以前是生气勃勃、敢想敢干的，可是成名以后，由于阶级地位起了变化，从一个‘卑贱’的仪器修理厂工人，变成了博耳顿——瓦特公司老板，……瓦特的晚年，不仅没有什么发明创造，而且以权威的身份压制工人的发明”。“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从一个反对尊孔读经的战士倒退成为一个维护尊孔读经的‘儒宗’”。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四人帮”的死党毛远新在黑干将迟群利用辽宁朝阳农学院经验大搞破坏教育革命活动。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和辽宁省委联合召开了学习辽宁朝

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和农林部门的负责同志，各高等农林院校和其他各类学校的代表，还有辽宁省各类学校的代表和市、地方文教、农业部门的负责同志。朝阳地区贫下中农代表、朝阳农学院毕业生代表和在校学员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不仅农林院校，而且各级各类学校、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机关，都应当学习、研究朝阳农学院的基本经验。毛远新在会议上公然叫嚣说他就是“朝农的后台”，以宣传“朝农经验”为名，疯狂地诋毁毛主席的《七·三〇指示》，贬低和否定毛主席“完全赞成”的、周总理辛勤培育的江西共大，胡说：“江南共大办得不怎么的了”，“老传统丢了”，唯独“朝农经验是具有战略性的”。要挟各省市的同志接受他的黑货，说什么“朝农的经验对不对？你们自己衡量。反正辽宁认为对，如果你们认为不对，权当辽宁白搭了几顿高粱米饭”！

十二月二十三日 迟群在学习朝农经验现场会上讲话，继续大反“因循守旧”，他说：“再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坚决的批判因循守旧”，“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宣言》中讲了两个彻底决裂，恩格斯说是‘历史性的堕力’，列宁把它比做一个‘挡在我们面前其重无比的大山’，斯大林则讲‘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毛主席讲的就更多了，要打倒贾桂思想，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最近我们有风庆风光两艘货轮远涉重洋，真是鼓舞人心，我看也是对贾桂思想的批判，对洋奴哲学的批判，对保守思想的批判。”在讲话中，他疯狂攻击革命知识分子说：“文化大革命前是有教训的，修正主义路线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

在同一会上，毛远新讲话乱提口号，胡说“大学就是大家

都来学”，“什么是大学生，贫下中农欢迎的就是大学生”。毛远新还恬不知耻，狂妄地自我吹嘘，鼓吹武斗。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就更大了，和工人、农民住在一块，和红卫兵住在一块，甚至参加武斗，组织武斗，咱们都锻炼过。”“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他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他再次申述树立坏典型张铁生的目的说：“对张铁生的那封信，都是这样，骂呀！说二十年后卫星上不了天张铁生负责。有人给我写信说，你不要以为拣了一块黄金，是捡了一块铜渣子。我说什么黄金铜渣子，是捡了一块石头，是有棱有角的石头，打你们这些阻碍教育革命的人。”“农学院培养的学生，首先得懂得这个，光懂得农村两条路线斗争不行，还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公然篡改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

“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蓄意破坏革命秩序。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张春桥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主要是抓上层建筑。……我们国家这么大，乱一点有好处，乱表现生气勃勃。”

“四人帮”宣传青年是天生的革命家。一九七四年底，谢静宜在北京三十九中讲话说：“谁说我们青年没有理想，我们青年人的理想早已树立了，就是解放全人类。”抹杀青年中间存在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她在和北京市×××中学干部谈话时，当汇报到有些学生胸无大志，缺乏共产主义理想，需要加强教育，她说：“现在的学生哪有坏的！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生长的。阶级敌人才这样说我们青年一代，你们怎么也这样说！”

## 一九七五年

一月六日 迟群在北大学朝农动员会上，公开反对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攻击学校中的党组织，胡说什么：“两个估计同样也适用于领导班子。”在会上迟群还攻击周总理在一九七二年根据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对抓好基础科学研究，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所作的重要指示，胡说什么：“有一年谈到加强理论研究问题，要在实践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但有人不要实践，他只要理论，传开后，成了加强理论研究，他就关起门来了。文革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在这股风中晕头转向。”迟群还恶狠狠地说，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是“一点陈年老货，有什么了不起！”

一月三十日 朱永嘉在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慰问团负责函授工作的同志汇报工作时，说什么：“我们把青年组织起来，给予他们学习，使他们旗帜鲜明，敢于斗争，能使他们去坚持斗争。给他们创造条件。组织他们学习，组织他们去斗争。叫他们（指各省领导同志）受不了。”妄图利用学校这个阵地，到处煽风点火，反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

三月一日 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军区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赤膊上阵，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把反“经验主义”当作纲，“联系实际”解决全党全军存在的问题。

姚文元在一篇文章中公开宣扬：“现在，主要的危险是经

验主义。”

三月二十一日 姚文元又指使《人民日报》在3月21日发表社论，公开叫嚣，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向新华社指令：“社论说到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你们要组织宣传，要搞典型，配合评论，这样才效果好。”《红旗》杂志短评《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耸人听闻地大谈“经验主义的危险性”。

三月至四月 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江青忙着到处送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材料，叫嚷：“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

东北某市某区的一个副科长为其子女上清华大学走了后门，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向迟群作了报告，反党分子迟群阴险地说：“你们搞了半天都是小官，小官走后门就不要退了。大官走后门你们查不出来，象北京卫戍区、部队、中央机关都有，走后门都是他们。”

四月四日 迟群在传达江青电话“指示”时说：“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

四月二十一日 周宏宝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在教育部召开的“各省市教育部门负责人学习朝农经验学习班”会上公然提出：“经验主义是阻碍我们前进的大敌。克服经验主义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需要。”等等，还要大家“批经验主义”时把“自己摆进去。”

九月至十月 王洪文在上海压缩机厂任意诋毁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公然叫嚷：“青少年教育工作要闯出一条路子来。”

十一月八日 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公然明目张胆地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胡说什么：“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张春桥在谈话中竭力抹煞两个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的激烈斗争，说青少年中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具体问题”，妄图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毒害青少年。当谈到大学生中一月土，二月洋，三月不要村姑娘时，张春桥胡说：“我是把你往阶级斗争上拉，你老是谈具体问题。”当谈到争夺青少年思想教育问题，黄色书《少女之心》不但城市有，农村也有时，张春桥胡说：“争夺青少年出现这样的问题，是现在多，还是过去多？是多了，还是少了？黄色书是多了还是少了？有些是抄家抄出来的，解放初马路上有的是，上海就是这样的，在资产阶级家里是公开的。”

十一月二十日 在上海市工宣队座谈会上，徐景贤说，“我们的看法是上海的教育革命一直是按照毛主席教育革命的路线来抓的，大家不要理亏，好象有什么辫子似的”，竭力为自己开脱，接着他又说：“我们关起门来讨论我们的问题，不然知识分子很容易把一些支流问题去渲染一下。同样道理对支流的问题有的人看起来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歌德派，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摇头派。”妄图拉大旗作虎皮，包住自己吓唬别人。

十二月一日 毛远新在辽宁各市、地委书记、文教书记，大专院校负责人及省直单位领导同志的会上，把当时教育战线上开展的大辩论说成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反对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制造舆论。他说：“北京有人讲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主席抓了北大的大字报，这次主席又抓了清华两封信，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同日在省委召开的干部会上有人汇报教育局干部学习班情况时，毛远新插话说：“我读的书可算不少了，我是学遥控的，后来下连当战士，可不懂得雷达，还赶不上初中毕业生在部队二年的雷达兵，……以后我又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参加了造反派，武斗也参加了，还指挥三千条枪，怎么样，锻炼很大。”

十二月六日 徐景贤在上海竭力吹捧“四人帮”，公然把张春桥、姚文元主持炮制的《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说成是“革命的法规”对抗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徐景贤说：“中小学要把春桥、文元在上海主持修改的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拿出来，纲要基本上是好的，有人说我们现在没有法规，其实

革命的法规早就有了。”

十二月 张春桥在与阿尔巴尼亚同志谈话时说：“从小学到大学，要念一大堆的书，他们说那是有用的，不读是不行的，实际上学生考试完了就忘了，要是忘了还好些，受毒少一些，问题是有些没有忘。”极其阴险恶毒地攻击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接着还说：“这几年，我们作了一点改革，刚迈出了一步，但步子不是很大，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艰苦的斗争，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这个队伍建立起来之前，上课的人还在继续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不加区别地把全体教师都推向资产阶级一边。张春桥还装出一付教育权威的架势，煞有介事地说：“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怎么搞，我们正在研究，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从儿童时期起每天劳动2小时，以后增加到4小时，6小时，所以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这是明目张胆地篡改马克思主义。

注：十九世纪英法资本主义国家工厂法规定，儿童9—12岁每天劳动六小时半，13—16岁每天劳动十二小时，马克思针对当时资本家大量使用童工，无限制地延长劳动时间，残酷剥削童工的情况，尖锐指出：“这种制度把工人降低为积累资本的简单工具，把那些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的父母变成出卖亲生儿女的奴隶主。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因此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提出关于当时儿童和少年的劳动时间的建议。张春桥却把它篡改为马克思对未来教育的设想，这恰恰又一次暴露了他是一个篡改马克思主义的老手。）

《红旗》第十二期上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别有用心地提出“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接着就横加歪曲地大批起：“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不讲学文化”、“实践——实践——实践”、“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一’”、“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等等所谓“教育界的怪论”。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之后，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曾先后对科技教育部门作了重要指示，在抓好群众性科研活动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专业科研机构的作用，对基础科学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一九七五年八月，中央负责同志明确指示：教育部要抓基础科学。一九七五年九月，华国锋同志指示科学院要重视理论研究，并指出，批所谓“理论风”是完全错误的，为了落实毛主席、党中央历来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的指示，教育部分别编辑了毛主席关于自然科学的部分论述，周总理关于基础科学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四人帮”炮制和发表大量文章，公然大批特批“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直接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大肆攻击“科研要走在前面”是什么“奇谈怪论”，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他们极力对抗和诽谤华国锋同志对批所谓“理论风”错误的正确批评，说成是什么为基础理论“翻案”。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竟然篡改华国锋同志“强调依靠工农兵是对的”这句

话，打进一个“相”字，变成“强调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然后张冠李戴地进行批判。周总理关于基础科学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刚刚编出，“四人帮”那个奔走于辽宁和北京之间的黑爪牙就采用特务手段私自窃走一份，然后送给“四人帮”的一个黑干将，并向野心家张春桥写诬告信，污蔑编印和学习周总理的指示是什么“党性不纯的表现”等等。到了一九七六年，他们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别有用心地把这说成是“总理语录”事件，然后大会、小会，会上、会下严加追查，制造白色恐怖。他们还声色俱厉地宣称：“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事件！”肆意迫害革命同志。

## 一九七六年

一月 教育部根据华国锋同志的重要报告中的要求，经过调查研究，起草了向中央和国务院报送的《教育战线为普及大寨县作贡献的初步意见》。迟群多次反对写这个报告，胡说：“搞教育为普及大寨县作贡献并无实际意义”，“学大寨的报告不要写了”。迟群的一个心腹公然指责草拟报告根据“哪个中央？！”猖狂叫嚣：“这个报告（指华国锋同志的报告）还能算数吗？！”

一月十四日 正当全国人民极其沉痛地哀悼周总理逝世的日子里，“四人帮”在各报头版头条以《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为题，刊登关于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报道，胡说什么“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连日来，大批热情洋溢的信件纷纷寄来”。企图以此

破坏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一月二十二日 张铁生在朝阳农学院讲话说：“教师队伍必须彻底改造，有些人立场、观点、思想感情没有根本解决，不能适应现在搞教育革命，这是自然现象，需要认识过程。对社会主义不适应，总得受约束。对十七年非常适应，那也就是适应苏修、美国、国民党的教育。这也不奇怪，都是世界观决定的。苏修打来了，他们可能打着白旗欢迎，很适应。这些旧知识分子，那时就不喊毛主席万岁了。下这个结论一点也不早，说他们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就是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也没多少，资产阶级思想在脑子里占百分之七十，所以才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一月二十八日 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张铁生窜到北大作反党报告。叫嚷要“狠狠回击在我们党内组织路线上的右倾思潮”，“狠狠批判我们党内组织路线上存在的非常严重的资产阶级法权。”胡说“在我们党内有很多民主革命派”，“这个民主革命派”善于“搞经验主义”，“党内的民主派是使党内出修正主义的一大祸根。”声言要从上到下，“动大手术”，“彻底改造领导班子”，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在他的黑报告中，极力反对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的正确估计，叫嚷什么：“这样一些人（指教师队伍）可以这样估计他们，不论是哪个社会，不论是哪个国家，不论是哪个阶级掌权，他们都可以凭着那点知识，本钱混饭吃。恐怕苏修打到中国来时，他们还可能打着白旗上街去

欢迎，这可没准。假如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话，恐怕他们比现在还高兴，比现在搞教育革命还适应，比现在还吃香、卖力、挣钱还多，这个恐怕是事实吧！我那么想：到那个时候，如果真的变了天下，他们就不可能再喊毛主席万岁了，也不敢再喊共产党万岁了。他们要喊谁万岁？咱就知道了，恐怕谁统治中国他就喊谁万岁，这有什么办法？世界观决定的”。竭尽诽谤之能事。

二月三日 张铁生窜到清华大学，迟群对张铁生说：“来到清华就是到家了，有什么话大胆讲。”“只有乱透了，我们才能掌权。”张铁生在清华全校大会上散布大量反革命言论，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鸣锣开道。他把全国解放后的文教战线说得一团漆黑：“到处布满着一个又一个的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这些土围子经过一次文化大革命，一个也没有了吗？不可能！”“（去年）七、八、九月份，国家的教育部，就是其中的一个土围子，正是这些土围子被张春桥同志批判的体无完肤，骂得胆战心惊”。他疯狂攻击革命老干部，破口大骂说：“现在的民主革命派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狂妄自大，自命不凡，主观武断，唯心主义，搞经验主义。所以说，一般的走资派他们往往都是民主革命派的变种，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他就是在我国出现修正主义的大祸根。”他恶毒攻击党的组织路线，叫嚷要动大手术，说：“我们必须大胆的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从我们教育战线岗位上赶快把他撤掉……这是教育革命的迫切需要”。说大专院校的第一把手中间“出现了人数不少的走资派、黑帮、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投降派。”“我们铁岭农学院根据辽宁省委（按，指毛远新）的指示精神，对我院的领导班子，动了一个大手术。这

个手术我们动了，而且还没有动完，……现在我们正沿着省委的指示精神，继续动手术，一动到底，争取不动第二回，不留后遗症。”叫嚷“必须采取有力的组织手段，采取组织手段，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手腕，……必须把我党在组织路线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得威望扫地”。他公然反对党的领导，说：“党的领导就是主席的路线的正确领导。”“在这次右倾翻案妖风当中，我们清华北大就是体现了党（按，指“四人帮”）的领导，他们坚持了原则，国家教育部长周荣鑫奇谈怪论统统是放屁，清华北大一点也没有执行，他们顶得好，……咱们辽宁也顶住了，一个字都没有传达，我看哪，这就是党的领导，这就是党的原则。”他们有一套反动的教育质量观：“说起质量来，资产阶级也会摆质量，他搞一些学术研究啦，搞一些科研项目啦，也不少，日本美国呀，他们科学技术水平不低，比我们先进得多，质量确实是个高质量，但是质量是有阶级性的，你那个质量是白的，我们不要。”“周荣鑫之流说我们不如过去的大学生质量高，不如过去中技高，我看哪，比过去大学生不知高多少倍，比十七年的大学老师高也不知多少倍”，“如果按照你们的质量培养学生，只能对我国的经济基础起着很重大的反作用，破坏作用……既然这样，我们又为什么不怀着无比仇恨的心理，把那些旧学校砸它个稀巴烂呢？”他杀气腾腾地说：“七三年省里捡到一块石头，回击修正主义思潮，今天我们愿做一把钢刀，直刺教育部。”

迟谢在听了张铁生在清华报告的录音后大为叫好，并给打气说：“说错几句也没什么，他们骂了我们那么多，我们说错几句，没什么了不起。”

二月 江青在打招呼会议四川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吹捧张铁生是“真正的又红又专”，支持他到处煽风点火，进行反党活动。江青说：“在一次会上，我支持了张铁生。我当时不知道是远新他们抓的。他带了四十个人去大寨学习，路过北京，要到清华看大字报，北京市不安排。他找了谢静宜、迟群同志，她们就安排了。他到太原，请他讲话，他点了火，他才是真正的又红又专。”

“四人帮”通过两校大批判组炮制出《再论孔丘其人》的反党文章，分别登在《北京大学学报》和《人民日报》上，含沙射影，借古讽今，攻击华国锋同志。

春节前，朱永嘉在复旦大学党委常委会上的讲话中，鼓吹利用学生放寒假机会，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分发反党材料，反对党政军领导干部。他说：“还是放寒假，你们把大字报选多印一些，带到全国各地去，去点点火。”“现在好比一张桌面上五根钉（四角和中间）都松了，我们先敲中间的一颗即教育战线，抓住不放狠狠的敲，敲得他们头痛，然后再敲其他的钉。”并声言：“春节后要大干。”

张春桥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在上海炮制了几乎所有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要印刷机“一天二十四小时开印”，印刷了几百万份这样的黑材料，散发到全国各地去。张春桥向他们的心腹授意说：“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应把‘换’字改成‘撵’字，旧人不去，就要撵。”

二月八日 朱永嘉在函授教师大会上公开煽动说：“你

们到外地去，要敢于二个触及，即触及当时的形势和时事。你们可以去点火，可以把材料（指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带到外地去发给他们。”

二月十日 张铁生在太原市湖滨会堂发表反党讲话。再次鼓吹“我们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上仍然严重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叫嚷“必须把党的组织路线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的威风扫地”，肆意丑化我们党，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舆论。在他的黑讲话中，极力反对党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叫嚷：“我们必须大胆地把那些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从我们的教育领导岗位上赶快撤销，”并胡说：“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党内堆积的垃圾清理出去，新鲜血液才能充实进来。如果我们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各个单位都照这样做，我们看形势一定会大好的。这样做也不是我们独裁，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

他在讲话中胡说：“咱们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论它的性质来讲，目的、意义，任务，我看和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基本是一样的。上、管、改大学，就是在学校里边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全面专政的一个大事迹。是特殊使命。……当小绵羊的人不识时务，不识抬举，糊涂，至少是个糊涂虫，……他们一点也不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争气。”

二月二十六日 江青以“看大字报”和“参观教育革命展览会”的名义窜到清华。在这之前党中央召开了打招呼会，二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江青专挑外单位来清华看大字报、看展览的人最多的时候，出头露面，招摇过市，其目的是为了对抗中央打招呼会精神，以“批邓”为名，另搞一

套，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到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

三月六日 两校大批判组以“梁效”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克己复礼再批判》的黑文章，大讲孔丘“蒙蔽了季氏，当上鲁国的中都宰，三、四年由中都宰而司空、司寇，最后并担任了三个月的摄相的职务”。打着“批孔”的旗号，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

三月二十日 《文汇报》针对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教育的指示，发表题为《基础理论的基础是什么》的反党文章，叫嚷什么“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基础理论，而是一心要复辟修正主义路线”。

四月七日 迟群在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学习中央两个决议会上的讲话中，大肆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他说：“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特别强调经验。但是，是什么经验，要作阶级分析。他们的经验就是复辟倒退的经验，退一步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对现在没有什么现实（意义），还给自己贴一点金。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那一套不行了！我们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尤其是造走资派反的经验”。

四月八日 北京市青年万人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谢静宜对信中“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十分反感，她恶狠狠地咒骂“老一辈、老一辈，现在还有几个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下



令要把这句话删掉，还不准把这封信同时送国务院办公厅。她还气急败坏地说：“干嘛送国务院？！国务院怎么样？右倾翻案风就是他们搞起来的！”把罪恶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华国锋同志。

五月二十八日 迟群在清华校机关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教导，鼓吹“教育决定未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将是由这样或那样学校出来的，受到训练的。”

五月 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员和干部学习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社论座谈会上讲话说：“讲到教育阵地，教师都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我们没有自己的教员、教授，以后靠他们才逐步培养了新的，但也是照他们的思想体系培养的，基本照旧，除了不喊蒋委员长万岁，也差不多。”

五月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说：张、姚的文章是从基本理论、基本实践的高度写的，可以作相对稳定的教材。”还无耻吹捧江青“直接领导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伟大斗争”。

六月 张春桥给上海的余党下达了两个黑指示。一个是关于调查阶级关系新变动的黑指示；他放肆地说，最近重读‘四卷’后，“越读越感到自己对今天各阶级的情况真是不甚了了。”又说：“这里需要具体地研究一九六六年以后的阶级关

系。”一个是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向两级所有制过渡的黑指示，他提出“我赞成对过渡问题采取积极态度”，并指出“穷队也要过渡”。又说：“这可能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朱永嘉遵照张春桥的旨意，指定上海师大、复旦师生下乡搞“过渡”调查，并极其狂妄地说：“半年以后要出一本调查报告集子，要象主席在农业合作化时所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那样，要送中央领导同志（指张春桥）加序言和按语，“过渡”是社会主义农业的大变动，总结是为了更好地指导运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得晚了，等到出来高潮已经过去。这次要抓得早。又说：“最后的调查可能形成一篇重要文章，就是由春桥写一篇《社会主义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今后制定政策的依据”。搞所谓“春桥思想”。

六月 毛远新在一次讲话中极力鼓吹“读书有害论”，说什么“宁可少读两本书，也别叫资产阶级熏染下一代。”

毛远新在一次讲话中疯狂攻击斯大林，胡说：“苏联历史上有两次教育大辩论。列宁在世时有一场大辩论，当时列宁格勒一派，莫斯科一派，争论的结果，列宁格勒派失败了，莫斯科派胜利了。当时他们的争论，也是说教育不正规，教育要消亡了，和我们现在的争论差不多。当时列宁也想教育革命。第二次大辩论是一九二九年或三〇年。斯大林提出教育主要是攻克科学堡垒。可以说是对列宁在世时教育革命的反攻倒算，结果列宁格勒派又上来了。联系到我们教育革命，在主席领导下，步子大，成绩大。但是有没有可能和苏联一样，出现那样的反攻倒算？苏联一反攻倒算，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那样的大学生都出来了。教育革命现在看还很可怜。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就可

能翻回去。”

六月二十二日 迟群在教育部全体人员大会上的讲话中疯狂叫嚣“眼睛要向上看，重点盯住当权派”。“首先看第一把手。要盯住支部、总支、分党委、校党委，一层盯一层。我们学校就要盯着北京市委，要看到教育部。教育部要看到国务院、中央。没这一手，怎么对付走资派？！”公然把矛头指向各级党委，直到党中央和国务院。

七月 “四人帮”背着党中央，私自以中央名义抛出两校大批判组搞的批“三株大毒草”的材料，打着“批邓”的旗号，另搞一套，把矛头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七月十八日 迟群与清华大学机械系压五班学员座谈时，打着“开门办学”的旗号，鼓动学生介入地方运动，反对党政军负责同志。他说：“暑期回去就是开门办学，说不介入，早就介入了，和走资派斗争不介入，抓什么纲？这不是理论脱离实际？！这是最大理论脱离实际。不要怕。”

七月二十五日 七六年招生工作座谈会上，各地同志曾经指出教育部推广辽宁试行的“三来三去”经验时，应报国务院批准，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有些同志和有关工作同志也认为应报国务院批准。但是迟群对此却别有用心地说：“教育革命在党内、干部中是否接受了我是打问号的”，“推广辽宁的经验是一场斗争”，影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并借口所谓“国务院领导同志很忙，送国务院谁批？”私自决定“不报国务院了，由

教育部转发”。(张春桥同意)。他们无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视华国锋为总理的国务院，不报请国务院审批，就以教育部教计字206号文件推广辽宁的经验，这是他们反对华国锋同志阴谋篡党夺权的又一罪证。

八月四日至五日 正当以华国锋总理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到唐山转达毛主席、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极大关怀和亲切慰问的时候，江青于当日晚，急忙赶到清华。她说：“我今天来就是为了使广大师生和外国人知道，地震后，毛主席、党中央就在北京。”她恬不知耻地以代表毛主席、党中央自居与华国锋同志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大唱对台戏。次日，当电台广播了华国锋同志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到达唐山的消息时，在“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的布置下，清华对此毫不反应，却调动了广播、战报、简报、文艺等一切宣传工具，大肆宣扬江青的“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为“四人帮”大造舆论。

八月十九日 迟群在教育部全体人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叫嚷：“说我有后台，无非说我的后台是江青同志，他们不是就以邓小平为后台吗？！”

八月二十五日 迟群在清华对校机关工作人员的谈话中说：“学校培养出来的人能反潮流，和走资派斗，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打99分”，“要把十分之九的精力放在同走资派的斗争上。”

八月二十六日 江青冒雨窜到清华。她说：“我想到小靳庄，他们不批准。这次到清华来，不出北京，他们管不着！”

大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她大讲要研究拿破仑、俾斯麦、梯也尔，说什么这些人死后，他们的妻子都是受害的。还说：“清朝有个宰相法式善，官作的很大了，但是他家原来地位很低，原来的主人办丧事，他还去做吹鼓手”，借此恶毒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还说什么“《红楼梦》里晴雯是左派，袭人是右派，是特务，是专盯左派的。这个现在有现实意义。”影射攻击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

八月二十八日 迟群在两校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江青对两校非常关心”，两校批判组是在“江青同志具体指导下开展工作的。”

毛主席病重期间，张铁生狂叫：“在这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现在是年轻人接班的时候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谦虚。”

九月九日 迟群在清华大学作反党讲话，叫嚷：要“警惕还在走的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要求民兵树立高度的战备观念，一旦有了情况，能够做到要多少人就出多少人，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妄图把青年学生拴在“四人帮”篡党夺权，搞反革命政变的战车上。

九月九日至九月十日 张铁生在辽宁省团委和省知识青年办公室作反党讲话，明目张胆地煽动反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狂叫“我对国家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一些人“召集到一起，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把仇恨

“变成斗争的炮弹”，“做好打仗准备！”

九月十二日 迟群、谢静宜盗用清华、北大两校全体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的名义，向江青写了“效忠信”。信中说：“准备应付各种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请江青同志放心。”

九月十四日 张铁生在一次谈话中说：“从学校看修正主义确有基础，对新生事物冷淡，使新生事物受压，老师就怕表扬，一表扬就孤立。这部分人主席掌权时说好，将来如果修正主义路线掌权，散布福利主义时，也就容易站过来。有很多人有不满意情绪不说，真正到了修正主义上台时，屁股就难免坐到人家那边去。”

九月十七日 迟群在清华再次动员给江青写“效忠信”，他说：“光是党委写封信还不够，可以给下边打招呼，让分党委，还有团委、学生会这样的群众组织写一些信。”

九月二十日 毛远新在辽宁的亲信写信给他，狂叫：“我们这帮‘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人‘能’在省一级的大机关里出出进进，指指点点，说长论短”，都是因为毛远新的“精心栽培”，“撘腰作主”所致。还胡说在别处“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找不到的”，在他们心目中所谓“最优秀的、英勇善战的、视死如归、智勇双全的接班人”就是“四人帮”及其爪牙，是“我们事业不可战胜的一笔财富。”他们“横心”要作“刺头”，“何止刺头，还要作利剑，直刺他们的狗头！”凶残的杀机暴露无遗。接着又摆出一付十足的奴才相写道：“我们大家还有一个共同的心事”，要毛远新“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而注意

身体，多多保重”，“加强、改善和锻炼你那多病的身体”，并且再三提醒要“千万千万注意呀！”真是无耻之尤。

九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 江青窜到清华大学农村分校，又窜到工物系，以“参加劳动”为名，大搞阴谋活动。二十七日吃午饭时，她别有用心地煽动说：“主席逝世以后，有的地方，贫下中农三天三夜吃不下饭，怕中央出修正主义。”接着，她以救世主的姿态说：“请大家放心，天塌下来我们顶着。”竭力把矛头指向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篡党夺权。二十八日下午，当有人给她拍照时，她说：“你们胶卷不要照我，……留着照重大政治事件。”当有人给她送苹果时，她又说：你们还是留着庆祝重大政治事件吧！她一再暗示她们篡党夺权阴谋会很快得逞。二十九日江青在工物系召集的座谈会上说：“主席逝世，我没哭过一声，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她还说：“主席见面就批评我……有些不是我的错，也批到我头上。”公然发泄对毛主席的仇恨。

九月二十九日 迟群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的一次讲话中说：“江青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来到清华，具有重大的意义。你们分校承担了非常重大的政治任务，它的意义之大将来你们就会了解了。”

“四人帮”密谋策划反革命政变达到高潮。张春桥在同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和中国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教育代表团的讲话中，妄图驱赶教育部干部到各省去抓“阶级斗争的动向”、“讯号”，进一步利用教育阵地进行篡党夺权。他说：“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阶级斗争是不会熄灭的。现在人民群众里

边，包括教育方面，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敌人也是有活动，这要做些调查。……要警惕，要研究些情况。”“你们不要只看教育部，要和全国联系在一起看，要从全国的大、中、小学的情况，从教育战线看全国，把眼光看远一点，更不要只看到教育部机关。教育战线历来是晴雨表，是和整个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相联的。那里有那么多青年学生，他们干革命是先锋，闹事开始也是他们。你们要从全国斗争来研究，抓住大、中、小学带方向性的根本问题，既看到教育革命的本身，也从全国看到反映了什么问题，是一种什么讯号？”

九月 毛主席不幸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活动，一再催促把所谓农村人民公社向两级所有制过渡的“调查集子”第一辑提前到十月十五日以前编出来，并要书前加前言，篇篇加按语。还说：“前言和按语的口气要大”，“要站得高，居高临下，讲点哲理。”妄想一上台就把“张春桥思想”这面黑旗公开打出来，作为他们的理论依据。

十月一日 江青窜到清华农村分校。她别有用心地把一本《哲学小词典》送给分校，说：“这本书原来的题目是《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说：“我只送给你们一本，你们有印刷条件，可以印。”公然对抗毛主席批评她乱送“材料”以及批判他们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把经验主义当作当前主要危险。妄图翻案。她为捞取政治资本，竟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大发谬论，胡说“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歪曲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把“科学社会主义”篡改为“历史”。她还以

谈历史为名，大讲政变经，为篡党夺权大造舆论。她说“康熙这个人很厉害，六岁登基。他身边有个大臣叫鳌拜，不让他掌权。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选了一些青少年进宫，一起踢球，折跟头，这些人都会武术。有一天鳌拜一人进宫，康熙就指使这些青年把鳌拜抓起来杀了，他做了六十年皇帝。”

十月四日 “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用梁效名义写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他们有预谋、有计划地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采取颠倒是非、制造谣言的手法，恶毒地攻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叫嚷什么“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这是他们加快步伐，妄图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信号。

十月六日 迟群在与清华大学的吴生荣、吴伟煜的谈话中说：“我们学校对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是学校地位，而是培养的人是造走资派反的。我们学校就是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